

並不是「大眾」的「文化」，實際上，它既不具有大眾性，也不具有文化性，這就是大眾文化作為流行文化所必然付出的代價。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內容盡在於此，作者力圖揭示的大眾文化對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也盡在於此。當然，這樣來理解大眾文化雖然深刻、透徹，卻掩蓋不了某種極端、偏激的理論傾向，關於這一點，作者在書中也直言不諱。不過，無論是作者還是我們都無法否認的就是，這樣一種對大眾文化負面作用的揭示，在大眾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確實起到了某種積極的警示作用。

隨着中國社會商業化和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大眾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可以說是高速前行，日新月異。

雖然它還沒有完全走向成熟，但很多缺點卻開始初現端倪，比如說，過度追求商業利益而忽視了對產品藝術品格的塑造；過度宣揚社會生活標準化、模式化的觀念而戕害了民眾生存的個性化色彩；過度追求擴大產品的營銷市場範圍而故意製造出虛假的生活需求，以致蒙蔽了民眾對自己真正生活需求的認知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及早認識、理解到大眾文化對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對中國當前大眾文化作出適度的批判，應該是抵制大眾文化消極影響、糾正大眾文化錯誤走向的一劑良方。正是在這裏，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凸顯了它的當代意義，也正是在這裏，《流行的代價》一書作出了它應有的貢獻。

大眾文化不僅試圖物化社會、摒棄藝術；還試圖從社會生活與社會心理兩個角度來欺騙和控制大眾。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文化既不具有大眾性，也不具有文化性，這就是大眾文化作為流行文化所必然付出的代價。

農民底層敘述的多重變奏

● 肖偉勝



侯永祿：《農民日記——一個農民的生存實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原有「社會主義」階層結構完全被打亂了。在「成功人士」英雄般的神話背後，一系列政治或商業權力或直接或隱蔽的運作下，原有的社會階層已被「新富人」、「白領」和處於底層的「下崗工人」，以及被現代化大潮甩在邊緣的農民階層所取代。這種社會階層結構的劇烈變動，很自然

農民侯永祿的日記保持了農民日記的最真實面容，既突破了過去底層敘述中以代言人自居的窘境，同時又能第一次以真正平等的姿態探觸到農民的生存核心地帶。

地復活了「窮人」和「富人」概念的記憶，在上世紀80年代曾一度天真地以為階級可以被現代化，甚至市場經濟消滅的幼稚夢想破滅了，我們重新真切地看到了身邊階級的赫然存在和出現。

在城鄉二元對立、貧富分化日趨加劇的嚴峻情勢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農村建設」的措施，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農民又一次躍入歷史的前台。「三農」問題重新激發起人們的想像和探討的熱情。反映農民生存實況的田野調查和調查報告紛紛問世，文學藝術力作不斷湧現。但這些對底層農民的「注意」更多是從上而下的單方面「關懷」，底層只是「被說」，他們的真正心聲或多或少地被忽視和掩蓋了。那麼，怎樣才能讓「底層」發出自己的聲音呢？

最近，陝西農民侯永祿的日記《農民日記——一個農民的生存實錄》（以下簡稱《農民日記》）出版了。他用和鋤頭一樣勤不離手的筆，堅持不懈地記錄了他和村民們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生存經歷，在某種程度上，無疑實現了「底層」發出自己聲音的願望。由於此書幾乎是把日記毫無修飾地原樣呈現，保持了農民日記的最真實面容，因而既突破了過去底層敘述中以代言人自居的窘境，同時又能第一次以真正平等的姿態探觸到農民的生存核心地帶，聆聽他們日常的矛盾、痛苦、敷衍、苟且等不乏瑣碎、平庸、趣味主義的凡俗曲調。

在這本印刻着歲月滄桑年輪的斑駁日記中，既沒有叱咤風雲的英雄義舉，也沒有波詭雲譎的浪漫故

事，只有草根庶民柴、米、油、鹽之類的日常生活實錄。但這並不意味着，它純然是民間歷史的真實寫照，毋寧說它是一種可供分析和閱讀的文本，充滿着國家意識形態和底層文化的角逐和爭鬥，以致作者在敘述之中也不可避免地抹帶上意識形態的印痕。因而，這本日記演繹的就不是單調瑣細的日常劇目，而是一齣底層敘述的多重變奏的活劇。

《農民日記》用魂牽農田、命繫莊稼的平凡瑣事和普通農民居家度日的困厄、艱辛和悲喜，見證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三農問題」，折射出一個家庭、一個村莊，甚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曲折命運。在這種歷時性的長時段敘述中，我們既可以從一個家庭、一個村莊的歷史細微變動中，洞悉中國農民近六十年來日常生活世界的艱難蛻變；同時從這些日常生活的小敘事中，在另一個側面窺探到現代民族—國家在中華大地上如何一步步建構起來，其中遭遇了怎樣的困厄、曲折和慘痛；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國家意識形態又是如何利用權力把底層文化納入到它的統制之中，而在此過程中，底層庶民雖積極地宣揚、參與主導文化活動，卻又在局部消解政治訓導和本能的拒絕中，頑固地保留着自己形式特徵的有趣現象。

對於處於社會底層的大多數草根庶民來說，關乎生計的日常瑣事永遠佔據了生活舞台的中心，也自

然成了《農民日記》着墨最多的地方，幾乎佔了全書大半的篇幅。但這些娓娓道來的日常瑣碎事情，並沒有使讀者感到些許枯燥和膩煩，反而激發起筆者想一口氣把它讀完的急盼和焦灼。或許是我們頭腦裏留存了太多教科書的講論，其冷漠、莊嚴和宏大的敘述早已將鮮活的日常生活世界榨乾和遺忘。正如有學者指出，對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回憶，多半被大事件所籠罩，揭秘和再評估，翻案，爭論，沉重的回望，意味深長的咀嚼，都讓人心情複雜。在眾多的歷史圖片中，出現得最頻繁的同樣是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人民是作為一個巨大的數量存在的，他們共同承擔着相似的命運，彼此間缺少差別，日常生活被遺忘，物質、感性、細節、氛圍，都從時代的集體記憶中消失了（吳亮：〈序言〉，載吳亮主編：《日常中國：5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9〕，頁9）。

侯永祿的《農民日記》用幾乎是個性化的樸素語言，記錄了屬於他那個世界的「物質、感性、細節、氛圍」，將久已淡忘的日常中國的面容幾乎重新亮呈出來；那些已發黃的老照片，殘破的契約、帳本等難得再覓的歷史證物，那些秦腔秦味兒的村言土語，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鄉規民俗，那些和諧家裏家外、鄉里鄉親的快板對聯，讓我們走進了那個歷史時代的最深處，似乎瞥見那一張張充滿人間冷暖而不乏堅韌的純樸面容，觸摸到瀰漫在底層日常空氣中的不安、苦楚和寬慰。

《農民日記》中所描摹的紛繁複雜的日常生活，除了以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以個體肉身生命延續為宗旨的、最為基本的日常消費活動外，還有雜談閒聊、禮尚往來等以血緣關係和天然情感為基礎的日常交往活動。翻開日記，我們很容易讀到關於侯永祿孩子們的婚事活動，家人生病求醫時的急切心情，以及母親去世時的悲傷情緒等方面的文字。同時，日記還忠實地刻畫出日常活動中具有較強惰性的、非創造性和重複性的觀念意識等。不言而喻，重複首先是日常生活的質地與紋理。食色居行，日月更替，偶然的生命因此而得以穩定、固着。重複也構成每個人成長的時空，使得人生經驗的擴展、修正和積累成為可能，這就注定了像侯永祿這樣的底層百姓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無法取決於自足自為，而不得不與社會和眾人融為一體。這就使得日常生活的苦難內容與重複的形式在日常困境中別無選擇、不得不相依為「命」。這種宿命般的滯重與哀痛不說則已，一旦說起來就不能不使生命裏難得的溫情也透出了悲涼的底色。在這個意義上，《農民日記》的「苦難」內容與相應的「重複」形式便具有了無邊的隱喻意味，並使得這種底層敘述在反覆之中掂量出表達的沉重；而這樣的重量恰恰又在語言層面上深化了對苦難的體驗。

當然，《農民日記》中的底層敘述並不僅僅停留在摹寫這些日常生活瑣事和日常觀念上。由於中共建國後作者長期擔任路一村裏的會計工作，因而他和家人的日常生活

《農民日記》用平凡瑣事和普通農民居家度日的困厄、艱辛和悲喜，見證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三農問題」，折射出一個家庭、一個村莊，甚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曲折命運。

底層農民文化一方面要順應、聽從國家意識形態的號令；但另一方面又會在局部對處於上層的官方文化進行抵制和反抗。這種抵制一般並不採取直接對抗的劇烈形式，而是運用較為隱秘的變通策略。

就更多地與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裹挾在一起。換言之，即便是這些日常生活世界貌似純然客觀的實錄，實際上裏面處處充斥着官方意識形態語彙和觀念。且不說那些為積極宣揚政策和慶祝各種「運動」成功而書寫的對聯、唱詞、兒歌、快板、詩歌等，也不說當地特有的民間曲藝「血骨尸」的演出，以及耍龍燈、舞獅子、跑旱船、鬧元宵等傳統節慶活動，單說從給自己小孩取名為「勝天」、「風勝」、「三勝」、「萬勝」和「爭勝」等極富時代政治色彩的語彙方面，也可以讓人深切地體會到老百姓的思維活動是怎樣一步步受控於主流意識形態的。

根據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霸權學說，官方意識形態在確立自己的文化領導權時，往往與底層民間文化之間構成馴化、衝突、妥協等複雜的角逐關係。也就是說，底層農民文化一方面要順應、聽從國家意識形態的號令；但另一方面又會在局部對處於上層的官方文化進行抵制和反抗。這種抵制一般並不採取直接對抗的劇烈形式，而是調整自身的姿態，運用較為隱秘的變通策略，力求爭取底層文化存活生長的自由空間。實用主義是底層文化所培育出來的日常思維，它遵循最少費力的原則。一旦民間社會面臨種種困境時，民眾出於功利的考量，往往對制度採取變通或違背的方式，以緩解生存的壓力。這樣一來，底層文化就不再僅僅充當了某一處於霸權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共謀，而會顛覆具有霸權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

當然，底層民間社會對處於霸權地位的意識形態之解構，一般可以分為兩種策略：首先是底層文化作為「小傳統」，它憑藉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念對抗以政治倫理為主要導向的官方意識形態，從而構成對作為「大傳統」的上層文化的挑戰和顛覆。譬如，在大躍進的年月，由於鮮蛋訂購計劃嚴重超標，而收購的價格又遠低於成本，同時小隊只是根據養雞戶的雞隻數量分配任務，這就導致那些養雞戶既賺不到錢，還受了不少氣，還不如沒養雞的農戶清閒安然。這樣一來，村裏便出現了藏雞、賣雞，甚至殺雞的荒誕現象。1958年開展的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全民動員去村裏、村外，上樹、上房捕捉麻雀，敲着臉盆和鑼鼓，但折騰了一天，全隊上百人只捉到一隻麻雀。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事情在以後的「運動」中之所以屢見不鮮，就在於底層民眾認為這樣的事情沒有甚麼實際功利價值，因而往往採取敷衍應付了事的辦法對抗上層的方針政策。

另一種更為有趣的策略是，底層民眾在堅守自己的文化趣味時，靈活地應付各種自上而下的文化改造，也就是說，積極主動地對新文化進行有效的挪用，甚至當面對上層文化的壓力時，還會採用陽奉陰違的變通辦法，以抵抗上層文化對底層社會的壓制和征服。政治學家史考特 (James C. Scott, 又譯斯科特) 研究群眾 (特別是農民) 對政府進行抗議時，發現「人民往往不會採取一些武裝或激烈的公開行動，因為這樣容易招來重罰，甚至殺身

之禍；他們會透過笑話、歌曲、不敬的手勢、或委婉的說法來表達不滿及憤怒。這類行為與平日對有權勢的人所公開表現的尊敬和服從是完全不同的。」(引自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頁104。)史考特將之稱為「隱藏的劇本」。

在《農民日記》中，底層採用「隱藏的劇本」的策略對抗主流話語，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尤其在「運動」頻繁的年月裏。底層民眾特別是對於那些失誤的方針、政策進行對抗，他們採用的形式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民間文藝樣式：對聯、唱詞、兒歌、快板、詩歌，甚至包括協議書和悼辭與訃文等。這意味着，當國家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想像與建構無法滿足底層民眾的生存壓力和生存需要時，那麼，這些政策制度的諸多規範，對於民眾心理的約束力將非常微弱，國家的權威也將受到嚴峻的挑戰。

事實上，民歌、民謠、兒歌、地方戲曲、快板等民間文藝樣式，往往用於鄉情風俗、節慶等重大活動之中，顯得既喜氣又熱鬧，既莊重又諧謔，既神秘又親近，既驚怕又嚮往，如此濃烈的渲染與誇張，相對於底層百姓的慘淡生計而言，何嘗不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呼喊與掙扎？一種於苦難深重之中的宣洩、期許、自振和聊勝於無的補償？正是由於「隱藏的劇本」的存在，任何一種上層文化都不可能對底層民間社會實行徹底改造。而在此過程中，一方面，國家意識形態利用權力把底層文化納入到了它的統制之中；而另一方面，它又留下了一些

形式，這些形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底層民眾依然可以利用它們表達自己的心聲與文化訴求。

通覽整本日記，我們很容易在那些貌似瑣碎的日常敘述中找到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宏大歷史線索。日記一開始就展現了侯永祿帶有創傷的兒時記憶，早早喪父的他和母親相依為命，孤兒寡母二人常常在保長、甲長催兵糧和差款的敲門聲中弄得肉顫心驚，不得安寧。從這些並不起眼的敘述中，可以折射出自民國保甲制度取代明清的里鄉制度以後，侯永祿所在的路一村社會秩序發生的變化。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基石是行政力量的強化。民國時期保甲制度的實施，在一定意義上，意味着明清時期以鄉約為象徵的倫理道德性村政向社會—經濟控制的村政轉型，也標示着中國現代民族—國家雛形的建立和對現代化的全面尋求。

因而，黃仁宇先生將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的新型高層機構，稱為原始型的統一政府。這就是說，民國保甲制度的創設，僅僅意味着家族作為一種村政制度被新的政區和權力結構所取代，它並沒有觸動鄉族勢力的社會—文化根基。而到中共建國後，保甲法被新型村政所取代，「破舊立新」的觀念更為強化，在各種「運動」頻繁更迭的大潮中，政治力量席捲到了鄉村社會。如此這般，仰賴於行政力量和大眾傳播媒介(日記中分別記錄了大眾媒介在當代中國變遷的歷史：從高音喇叭、報紙到收音機，從電影到電視

在《農民日記》中，底層採用「隱藏的劇本」的策略對抗主流話語，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底層民眾採用的形式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民間文藝樣式：對聯、唱詞、兒歌、快板、詩歌，甚至包括協議書和悼辭與訃文等。

乃至電話)的廣泛延伸，使地方社會密切地與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成為後者的一份子。

可以說，《農民日記》通過重點反映二十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運動對中國鄉村民眾的影響，折射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艱難與曲折的歷史。正如黃仁宇所說，在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政府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澤東和中共也構成了一

種發號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由此創造了一個新的底層結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300)。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由國民黨製造的新型高層機構和由中共創造的新的底層結構，共同完成了對古老中國的現代化改造，從此，一個全新的現代民族—國家崛起於世界的東方。

從革命理想主義到政治現實主義

● 黃小艷

楊炳章試圖用「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解釋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這一轉變與長征期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上台掌權同步發生。



楊炳章著，郭偉譯：《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以下簡稱《從革命到政治》)，引用只註頁碼)是美國歷史學家楊炳章(Benjamin Yang)於1990年出版的一本全面研究長征的學術專著，該書系統而全面地考察了長征的來龍去脈，並試圖建立一個研究框架或模式——用「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解釋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楊炳章指出：「從中共領導層的發展方向來看，二十世紀30年代中期是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向政治現實主義的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化的時期」。「在整個轉變過程中的每一步、每